

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分析

——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二

吴桂兵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The patterns of “The Second Year of Jianyuan” tombs in Eastern Jin dynasty founded in Ma’ anshan was quite special. The excavation briefing thought it was Brick Tombs with front and back chambers. To combine it with other Wu period and Jin dynasty tombs in this area, it thought its patterns were one main chamber plus a side chamber. The briefing also compare it with one big tombs foun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Nanji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se, it gives a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near squareness Jin dynasty tomb’s space-time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rea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tse River), it also probes into how two Jin dynasties’ social changes influenced tomb culture.

Key Words :Ma’ anshan Eastern Dynasty Tomb Tomb Pattern Partial - chambered Tomb

内容提要 马鞍山地区发现的东晋“建元二年”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发掘简报认为是前后室砖墓。结合该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认为其形制为主室附加侧室,并将其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全面考虑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平面形制近方形晋墓的时空发展,探讨两晋社会变迁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马鞍山 东晋墓 墓葬形制 偏室墓

中图分类号 K871.42

文献标识码 A

《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刊登了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的发掘简报。在墓葬形制介绍部分,简报将该墓认定为前后室墓。笔者以为,简报对该墓形制的认定有误,现结合马鞍山地区吴晋墓葬发展序列分析该墓,并就此论述两晋偏室墓的相关问题。

—

根据发掘简报,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位于该市慈湖乡林里村。清理前,墓葬的排水沟、墓道、墓顶等部分已遭到建筑机械的破坏,墓上设施

未有发现。墓葬由排水沟、墓道、封门墙、甬道、石门、近方形前室及长方形后室组成,前室和后室之间有短甬道相联;墓向近正北;其前室壁长约4米,长方形后室的长宽都超出了3米,规模较大;墓葬前室为四隅券进式的穹隆顶,后室为券顶;在墓葬的封门及后室的墓壁上都设置了挡土墙,前室东壁偏北处设置了一方形小龛,在临近后室甬道口处搭建了一砖台。少量墓砖模印隶体反书的“建元二年九月三日历阳”、“张氏”,此外还有钱纹、几何纹、太阳纹等;铭文及纹饰砖大多见于前室穹隆顶,后室券顶上也发现少量太阳纹砖。清理

收稿日期 2005-06-30

时,该墓棺木已朽,尸骨无存^[1]。建元二年为344年,即东晋康帝司马岳做皇帝的第二年。

清理时,考古人员即已在该墓前室穹隆顶的东北角、后室西北角等多处发现盗洞,墓内积满淤泥,随葬器物多已离开随葬时摆放的位置,许多器物都是在室内整理时才拼接成形的。根据发掘简报,该墓出土器物按质地分有青瓷器、陶器、玉器以及金银器等等。

从发掘简报的描述,特别是该简报认为该墓是一座前后室的砖墓来分析,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须面对的就是如何去解释在东晋时期的南方地区为何出现此前后室形制的墓葬^[2]。简报对该墓形制结构的认识恰恰就是问题所在。其一,我们如何去解释在东晋时期的南方地区普遍出现近方形、长方形单室墓的同时,而在当时东晋都城建康附近的马鞍山却出现了前后室形制的砖墓呢?而且,墓葬甬道的方向和前后室排列方向成90度,这是一种奇怪的墓葬形制。其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按照报告认定该墓为前后室墓平面形制结构时,我们也就忽视了把该墓作为方形单室附带侧室的墓葬形制的可能。这就掩盖了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发现的两晋墓葬中极少见的偏室墓^[3]。笔者以为,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也就是南方地区目前考古发现极少见的偏室墓。简报认定的前室即为偏室墓的近方形主室,简报认定的后室也就是该偏室墓附带的侧室。上述对该墓形制的认定可以从马鞍山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中析得。

据民国《当涂县志》记载,在民国二十一年马鞍山地区就在采石发现了西晋时期的墓葬^[4]。尽管材料并不是科学发掘的,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5]。1949年以后,马鞍山地区陆陆续续发现了不少吴晋时期的墓葬,但有考古发掘报告的材料仍不是很多。现按孙吴、西晋、东晋三个历史时期,分别描述其墓葬演变状况。

马鞍山地区孙吴时期的墓葬发现不少,其墓葬平面形制现在大约可以分出三类。

第一类即较大规模的多室墓。如寺门口东吴墓、宋山东吴墓等。另在该地区发掘清理的有可能是东汉晚期的独家墩墓也应归入此类。(形制上略有区别)寺门口东吴墓总长约10米,由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另在前室的两侧附带了两个侧室,两侧室均出土了铜镜、棺钉等,估计也应为葬人之墓室^[6]。在雨山乡发现的宋山东吴墓总长17.68米,由斜坡墓道、封门墙、横前室、前后室间甬道、后室

组成。在横前室的前壁甬道的两侧各设置有一与甬道平行的耳室^[7]。独家墩墓与上述二墓略有差异,其在横前堂后并列两相通联后室,左后室大,右后室小,横前堂墓壁上开设有三个小耳室(图一:1)。

第二类就是以朱然墓为代表的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墓葬^[8]。1984年发掘清理的孙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墓葬由封土、墓道及前后室等组成。前室结顶为四隅券进式,后室为券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类墓葬前后室之间有通道,但不明显,也没有形成结顶(图一:2)。另外在朱然墓旁侧发现的朱然家族墓也属于此类前后室“吕”字形墓葬^[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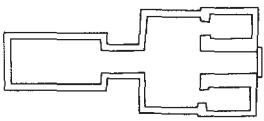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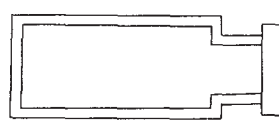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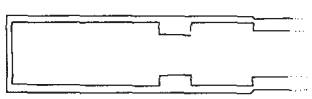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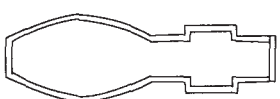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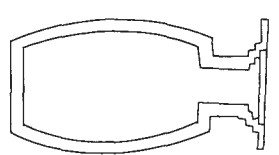
第三类即是普通的规模较小的单室墓。典型墓例可以马鞍山市佳山东吴墓为代表^[10]。该墓由墓门、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凸”字形;甬道长0.90米,墓室长3.40米(图一:3)。另马鞍山山东苑小区的M4也属于此类墓葬^[11]。

上述孙吴时期的墓葬大多被盗扰过,但尽管如此,各类墓葬出土的随葬品还是能够反映出马鞍山地区孙吴墓葬随葬品的整体面貌,而且各类墓间还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因第一类墓葬目前没有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所以无法知道它们出土随葬品的具体情况。其中的宋山大墓出土木棺及其他器物数十件,以青瓷器为大宗,有虎首罐和鸡首壶等,另有大量残漆器及“大泉当千”钱多枚。总结第二三类墓葬,其随葬品约略呈现出如下面貌。

其一,随葬品中有大量的青瓷器。其青瓷器的种类较多,大约可以分出三组。第一组为碗、盘、盏、盘口壶、罐、香熏等日常生活用品;第二组为仓、磨、碓、厕圈、羊圈、鸭笼以及其间附属的羊、猪等生产明器类;第三组为人俑、镇墓兽、穿山甲、牛车等。上述诸类青瓷器各器类在釉色、器胎以及施釉特征上多有差异,反映出马鞍山地区孙吴时期的墓葬随葬品的来源的多样性。

其二,在马鞍山区的孙吴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与青瓷器共存的还有不少的陶器。其器型有属于生活用品类的罐、盆等;有属于生产类明器的磨、井、鸡、鸭等;其三,出土了大量漆木器。计有漆盘、漆案、漆榻、漆凭几、漆尺、漆砚、木刺、木谒、木匕等。在漆盘、漆案等器表绘有人物故事、宴乐等漆画,木刺、木谒上面往往墨书死者的姓名、籍贯、官职等内容。

其三,随葬生活用铜器也是该地区孙吴墓葬的随葬品面貌之一。其器型有铜镜、炉、熨斗、鏃斗

	多室墓	前后室墓	单室墓
孙吴	 1	 2	 3
西晋		 4	 6
		 5	
东晋			 7

图一// 马鞍山地区吴晋墓葬演变示意

1. 宋山吴墓(因该墓材料未发表,据鄂州鄂钢饮料厂 M1 示意)
2. 朱然墓 3. 佳山吴墓 4. 桃冲村 M2 5. 桃冲村 M3 6. 霍里乡 M1 7. 孟府君墓

等 ;几乎每座墓葬里都出土数量较多的铜钱 ,不仅有本时期比较少见的 ,同时出土了大量的前朝铜钱。其四 ,出现了少量的釉陶器。其器型有钱纹罐、双系罐、四系罐等。上述各类随葬品中 ,青瓷器和陶器的同样器型在形态上几乎一样 ,但青瓷器的器型使用范围比陶器的使用范围要广 ,有些器型只有青瓷质地。如穿山甲、镇墓兽、牛车等。绘制精美漆画的漆器出现在朱然墓中 ,朱然的地位较高 ,这也许是其墓葬随葬此类漆器的原因之一。

马鞍山地区的西晋墓葬多有纪年材料 ,如太康七年、永嘉二年、建兴二年、建兴四年等。这给该地区西晋时期墓葬的划定提供了很好的标尺。依据墓葬的平面形制 ,我们可以看到该地区西晋墓葬有如下几类平面形制。

第一类类似于孙吴时期墓葬中的前后室“吕”字形墓葬 ,由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如该市霍里

镇桃冲村 M2^[12] ,但规模要比朱然墓小得多 ,墓残长 6.5、宽仅 1.7 米(图一 :4)。该墓墓砖上有“建兴四年八月五日辛酉”、“建兴四年太岁在丙子”等铭文。此类墓葬前室和后室之间的过道不明显 ,以砖柱间隔前后室。

第二类墓葬平面形制由甬道、前室、前后室间过道、后室等组成。此类墓葬前室一般呈方形 ,后室呈长方形 ,且后室的左右墓壁略外弧 ,前后室之间的过道明显。典型墓例如该市霍里镇桃冲村 M3^[13] (图一 :5) ,该墓总长 6.85 米 ,墓砖上反书有“永嘉二年九月一日丹扬徐可作砖壁”铭文。另外马鞍山市郊卜塘镇的盆山农场的盆山 1 号墓也属此类^[14]。

马鞍山地区西晋墓葬的第三类墓葬平面由甬道及长方形单室组成 ,平面呈“凸”字形。1986 年 10 月在马鞍山市霍里乡桃冲村清理的两座西晋墓就属于此种类型的墓葬 ,两墓均为小型的砖砌

券顶单室墓。其中的M1由封门墙、甬道和墓室组成,长方形墓室略外弧,墓葬总长达4.72米(图一:6)。桃冲村M2的墓葬形制基本上与M1的形制相似,但其墓葬前部不知是挡土墙设置的不同,还是残毁,与M1此类墓葬略有差异。该墓出土有“建兴二年”铭文砖。另马鞍山下辖的当涂太白乡发现一座砖石混构墓,形制不明,但出土了“太康七年造”铭文砖^[15]。

马鞍山西晋时期墓葬随葬品组合主要由以下五类组成。其一,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青瓷器。其器类有钵、碗、盏、盘口壶、唾壶、四系罐、香熏、狮形插器器座等;其二,为青瓷明器类。其器类有谷仓、猪圈、狗窝、鸡笼等;其三,为日常生活用铜器。其器类有洗、鏃斗、镜、斧、炭炉等;其四,为装饰类日常生活用品。其器类有银钗、银镯、银指环、玻璃珠等;其五,为俑类。仅见于桃冲村M2,据发掘简报,俑为青灰色陶俑。

马鞍山地区东晋墓葬仅见平面形制呈“凸”字形的单室砖墓。如在该市湖东路小学发现的孟府君墓^[16]、当涂县黄山东晋墓^[17]、该市慈湖乡林里1992年发现的东晋墓^[18],均属于此种类型的墓葬。孟府君墓由墓门、甬道和墓室等组成,墓门两侧平砖纵砌挡土墙与封门砖相连;甬道为券顶;墓室东西两壁外弧,墓顶为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图一:7)。孟府君墓出土“太元二年八月廿五日建公墓”铭文砖。

马鞍山地区东晋墓葬随葬器物的组合情况有五点值得注意。其一,为青瓷质地的日常生活用品。其器类有盘口壶、鸡首壶、唾壶、洗、罐、碗、盘、杯、熏炉等;其二,为日常生活用品类陶器。其器类有凭几、圆盘、耳杯、孟、勺等;其三,新出现的砖刻墓志;其四,出现了滑石类明器。如滑石猪、滑石弩机等;其五,随葬品中有金片、玉器等装饰类器物。

尽管马鞍山地区的孙吴、西晋及东晋时期的墓葬公开发表的材料并不是很多,但根据上述对墓葬平面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及器类的大致状况的梳理,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出该地区各历史时期墓葬的面貌及其间发展变化的差异^[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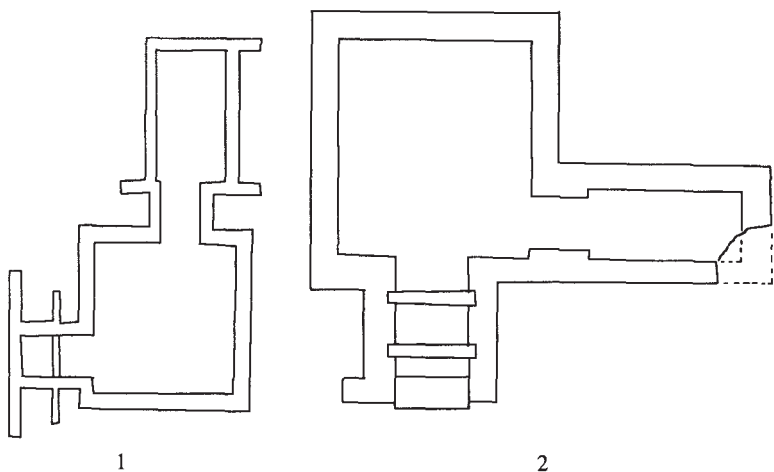
在墓葬形制方面。孙吴时期的墓葬形制比较复杂,其间既有规模较大的多室墓,又有目前能够证明身份较高的墓葬。该时期墓葬平面形制多室、吕字形以及简单的单室墓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反映了该地区孙吴时期墓葬平面形制的多样性。西晋时期,该地区那种规模较大的多室墓已经不见,即使出现了类似于孙吴时期“吕”字形形制

的墓葬,但规模远不能和孙吴时期的“吕”字形墓葬相比;该地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前后室墓,其前室近方形,后室长方形,两墓壁略外弧。此类型墓葬与“吕”字形墓葬应该有一定关联,但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与上述两类并存的是规模不大的“凸”字形单室墓,墓室的两壁已经开始外弧。东晋时期,该地区墓葬平面形制已经比较单一,目前见到的都为“凸”字形单室砖墓(图一)。

在墓葬随葬器物方面。与孙吴时期该地区墓葬平面形制复杂多样相一致的是,马鞍山孙吴时期墓葬的随葬品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首先,该时期青瓷器与陶器并存。青瓷器的种类较丰富,既有生活用品,也有模型明器,同时还有人俑、镇墓兽、牛车等;而陶器基本上就是模型明器。其次,出现了绘制精美漆画的漆器。西晋时期,该地区墓葬中不见陶质模型明器,青瓷器中的生活用品及模型明器仍然可见,但出现了如狮形插器器座的新器型。该时期还出现了银镯、玻璃珠之类的装饰类随葬器物。东晋时期,马鞍山地区墓葬中青瓷质地的模型明器已经不见,同时出现了以凭几为中心的器物组合。另外,还出现了滑石制作的明器。装饰类随葬器物仍是本时期习见的随葬组合。值得注意的是,铜器类生活用品在上述三个时期的墓葬中均有发现。

从上述对马鞍山地区出土吴晋墓葬材料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马鞍山地区的吴晋墓葬显然经历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其前一阶段即为孙吴至西晋时期。此一阶段主要以多室墓和前后室为主;其后一阶段即为东晋时期。其墓葬主要以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墓为主。上述两主要阶段的划分并不能截然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多室墓向单室墓的发展,在多室墓阶段已经出现的一些墓葬形制方面的特征,如四壁呈弧形,也继续在单室墓上出现,而且此后竟发展成一种主要的墓葬形制特征,此是一方面。在两个主要阶段之间,如孙吴西晋时期的墓葬形制中,前后室墓的发展在孙吴和西晋两个不同的王朝时间里,其发展是有一定的时间差异的,墓室的四壁也从平直逐渐外弧,但这种外弧并不同时体现在前室和后室上;凸字形单室墓成为该地区一种较主要墓形后,其早期的墓室平面仍然呈较明显的四壁外弧,显然有继承本地区前一阶段墓葬形制特征的明显迹象。

现在,我们再重新分析一下马鞍山慈湖乡林里东晋“建元二年”墓。发掘简报认为该墓为前后



图二 //

1. 马鞍山“建元二年”墓平面示意 2.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平面示意

室形制的墓葬,显然与马鞍山地区已往发现的孙吴至东晋时期的墓葬形制发展状况不符。马鞍山地区墓葬形制的发展是从多室渐趋单室,到了东晋时期,该地区的墓葬平面形制为“凸”字形,而孙吴时期的前后室“吕”字形墓以及西晋时期的两类具前后室形制的墓葬已经不再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为近方形主室附加侧室的墓葬结构,其墓葬主体仍是由甬道、近方形主室组成的“凸”字形墓葬(图二:1)。

二

当我们认定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为主室附加一侧室的偏室墓时,其作为考古材料的价值才得以显现出来。这首先涉及到对另一重要墓葬材料的解读,也就是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由墓门、甬道、主室及主室之侧附设的侧室等组成。主室和侧室之间以甬道相通,主室甬道内有两道门槽^[20](图二:2)。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墓的时代以及墓主身份均产生过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该墓葬平面形制的特殊性,而且,在南方地区已有的东晋大墓中属于孤例。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在规模和平面形制上均有一定的相似性。从两座墓葬的发掘简报来看,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的主室甬道内置一道石门,且甬道偏于一侧,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主室甬道内有两道门槽,甬道基本位于主室墓壁正中;马鞍山“建元二年”墓的挡土墙的设置也比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要复杂一些。从近方形

主室和挡土墙的复杂设置观察,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与南京北郊汽轮电机厂东晋大墓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21]。而简报推测汽轮电机厂东晋大墓的墓主是东晋穆帝司马聃。据《晋书》卷八记载,升平五年“五月丁巳,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十九。葬永平陵,庙号孝宗”。穆帝升平五年即361年。马鞍山“建元二年”墓和南京汽轮电机厂东晋墓中均出土了青瓷盘口壶,从形制观察,南京汽轮电机厂墓中的青瓷盘口壶比马鞍山“建元二年”墓中的显得高挑,器腹的重心也略高,其时代应稍晚。“建元二年”

为344年,那么,马鞍山“建元二年”墓的绝对年代应该距此较近。

当我们否定发掘简报对“建元二年”墓形制的认定时,我们也很自然地注意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马鞍山林里东晋“建元二年”墓的主室平面呈近正方形,且四壁直。这一点与该地区墓葬面貌有着较明显的差异,依据前文的描述,我们知道该地区的东晋单室墓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西晋时期,部分墓室四壁已经开始外弧。马鞍山林里东晋“建元二年”的出现显得过于突兀。但当我们暂时考虑墓室平面为正方形,且四壁较平直时,这样的墓例南方地区还有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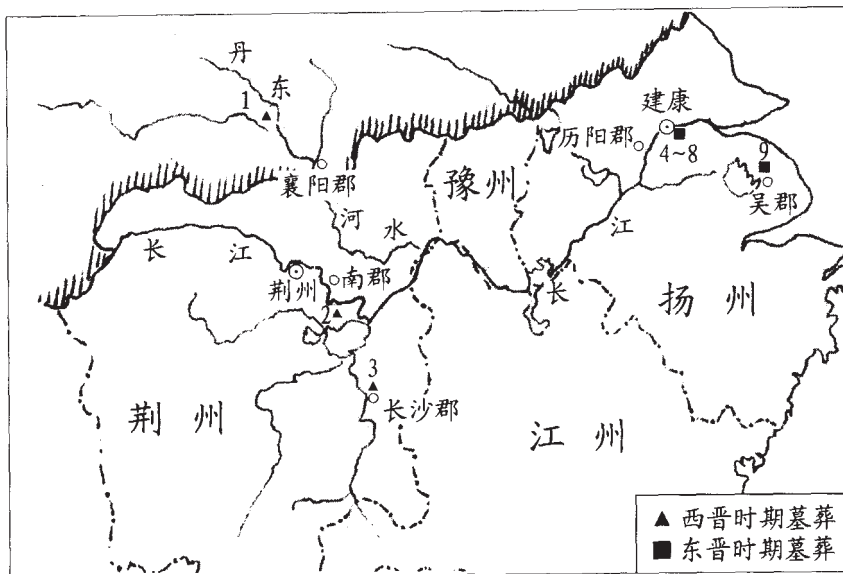
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主室平面形制方形或近方形的“凸”字形单室西晋墓主要有如下几例。

1. 湖北均县六朝早期墓葬^[22];
2. 1991年在湖南省安乡发现的西晋刘弘墓^[23];
3. 湖南长沙发现的部分西晋墓葬^[24]。如长沙晋墓M21。

东晋时期的此类墓有下列数例。

4. 南京象山7号墓^[25];
5. 南京北郊温峤墓^[26];
6. 南京北郊汽轮电机厂东晋大墓^[27];
7. 南京北郊郭家山M4^[28];
8. 南京富贵山东晋大墓^[29];
9. 江苏吴县何山东晋墓^[30]。

上述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两晋平面近方形单室砖墓数量不是很多,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属于西晋时期的此类墓葬发现较少,而且主要



图三// 两晋长江中下游地区平面形制近方形单室墓分布示意

1. 湖北均县六朝早期墓 2. 刘弘墓 3. 长沙晋墓 4. 南京象山 M7 5. 南京北郊温峤墓 6. 南京北郊汽轮机厂东晋大墓 7. 南京北郊郭家山 M4 8. 南京富贵山东晋大墓 9. 吴县何山东晋墓(底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之《东晋》)

集中在长江中游。刘弘墓发现地安乡属于西晋荆州的南平郡,与当时的荆州治所相距不远;其二,东晋时期,此类墓葬发现较多。且基本上是发现在当时都城建康及其周边地区(如吴郡)。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此类墓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动态发展和静态分布(图三)。

上述东晋墓例依据墓门的多少可以分出三组。

第一组,甬道内发现墓门槽两道。如南京的汽轮机厂大墓,墓主室平面近方形,长 4.98、宽 4.24 米。简报初步推测该墓为东晋穆帝司马聃的陵墓。

第二组,甬道内发现一道墓门槽。如南京象山 7 号墓、南京北郊温峤墓、南京北郊郭家山 M4。南京象山 7 号墓保存完好,墓室平面略呈方形,长 3.90、宽 3.22 米。报告推测象山 7 号墓墓主为王廙。温峤墓为附长甬道的单室穹隆顶砖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长 3.96、宽 3.75 米。

第三组,甬道内未发现门槽。1978 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吴县何山发掘的东晋砖墓即属于该组^[31]。该墓为一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穹隆顶砖室墓,由封门墙、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长方形,券顶,在甬道内未发现门槽遗迹;墓室平面近方形,

四壁略外弧,南北长 3.9、东西宽 4 米。

如此,单纯考虑主室平面形制时,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和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就应划入东晋建康及其周边地区此类墓葬群中去。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有两道门槽,应该划归上述的第一组,且该墓主室长 4.4、宽 4 米,与第一组墓规模相差不大;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甬道内有一道石门,应该划入上述东晋墓葬群的第二组,其主室规模也大致相当。

上述诸墓中,有明确墓主身份的,一是刘弘,一是温峤。据《晋书·刘弘》记载,刘弘“少家洛阳,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后因旧恩起家。其仕宦

经历大致可以分出三个阶段,其初为京官,历太子门大夫、率更令、太宰长史等;后由于甚得张华看重,得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刘弘在北方的工作应该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后得封宣城公。西晋太安年间,因张昌作乱,刘弘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从此开始了他在南方荆州的活动,直至卒于襄阳^[32]。刘弘基本上是北方人,与西晋的都城洛阳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墓葬也体现出了与南方地区墓葬的不同。长沙的 M21,也有学者指出其在形制和部分随葬品面貌上,与中原地区无异^[33]。这大概可以说明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此类西晋墓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关系。温峤《晋书》卷六十七有传,其世居北方,在东晋政权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身份较高。对建康地区此类其他墓葬墓主身份的推测,也说明墓主的身份均较高。

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另外,还有两个前提。其一,就是我们对中原以洛阳为中心地区的近方形单室墓的认识;其二,就是两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洛阳北方地区之间的交通^[34]。如果再考虑到两晋政权在制度上的关联,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呈现给我们的信息就相当丰富了,这是我们错误地将其认定为前后室墓所无法认识到的。

至于“建元二年”墓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主室附加侧室的形制,是应该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行展开来的。但考虑到此类墓葬在南方地区目前仅此两例,分析的基础仍然必须来自北方的材料,容另文探讨。

(2003年秋冬,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周到安排下,笔者带领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马鞍山考古实习。此间,承马鞍山市文管所王俊所长、考古部栗中斌主任安排,得以观看到该地区吴晋墓葬的相关材料。特此感谢!)

- [1]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马鞍山林里东晋纪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
- [2] 东晋时期的前后室墓在镇江地区曾有发现,有着一定的区域特点。参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6~39页。
- [3] 关于两晋偏室墓的初步研究,读者可以参见吴桂兵:《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形制、墓主及其他——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一》《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两晋墓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之前有汉、三国墓葬,此后又有十六国北朝、南朝墓葬。笔者希望先从两晋偏室墓研究开始,逐渐深入下去,并期得到学界的呼应、论争。本文关于马鞍山“建元二年”墓的分析是笔者两晋偏室墓系列研究中的一篇。
- [4] 鲁式纘等编《当涂县志》,志收录在《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9、4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据1936年志成后之抄本影印,第40册第106页。
- [5] 徐中舒:《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3分册,又载《学风》第3卷第3期,1933年。后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中华书局1998年9月。
- [6] 寺门口墓、独家墩墓材料未发表,情况承马鞍山市文管所考古部栗中斌主任来信告之。
- [7] 吴志兴:《马鞍山发现大型六朝墓》,《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19日第3版。
- [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 [9] 栗中斌:《谈朱然家族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 [1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市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第5期。
- [11] 吴志兴、王俊、殷春梅:《马鞍山东苑小区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总第11辑,1998年10月。
- [12] [13]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等:《安徽马鞍山桃冲村三座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11期。
- [14]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马鞍山市盆山发现六朝墓》《文

物研究》总第6辑,1990年10月。

- [1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霍里乡西晋纪年墓》《文物研究》总第12辑,1999年12月。
- [16]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马鞍山东晋墓清理》,《考古》1986年第6期。
- [17] 王俊、李万德:《当涂县黄山东晋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总第9辑,1994年11月。
- [18] 杨旭霞:《马鞍山市林里村东晋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6月。
- [19] 关于马鞍山地区吴、西晋墓葬的发展情况,读者还可以参考韦正:《东吴、西晋墓葬形制演化中心区域的转换——以马鞍山地区为观察点》,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69~282页。
- [20]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后收入蒋赞初:《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 [21] [2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4期。
- [22]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均县“双冢”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 [23] 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 [24]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25]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 [2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第7期。
- [2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 [29] 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 [30]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何山东晋墓》,《考古》1987年第3期。
- [31] 另吴县东晋张镇墓平面形制与何山东晋墓较相似。参见注[19]文中图六5。
- [32] 房玄龄等撰:《晋书·刘弘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763~1768页。
- [33] 韦正:《简论西晋时期的南北士族墓葬》,《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另近来有研究开始关注该墓中的鼓吹佣,可以为我们从另一角度观察此类墓葬。参见岳起、刘卫鹏:《关中地区十六国墓的初步认定》,《文物》2004年第8期。
- [34] 关于两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北方地区的交通,可以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梳理的北方人民南迁之路线,氏著《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98~223页。